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卷宗編號：316/2023

(司法上訴卷宗)

日期：2024 年 10 月 17 日

司法上訴人：A 及 B

上訴所針對之實體：經濟財政司司長

一、概述

經濟財政司司長(以下簡稱“上訴所針對之實體”或“被訴實體”)於 2023 年 3 月 3 日作出批示，駁回了 A 及 B(以下簡稱“司法上訴人”)的必要訴願，並維持了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代主席宣告臨時居留許可失效的決定。

司法上訴人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起司法上訴，並在起訴狀中點出以下結論：

“1. 經濟財政司司長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授予的執行權限於 2023 年 3 月 3 日在第 PRO/00857/AJ/2021 號建議書上所作出的批示。該批示決定駁回 C 於 2021 年 3 月 25 日提起的必要訴願，並維持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代主席於 2021 年 2 月 26 日作出宣告眾司法上訴人有效期至 2021 年 10 月 18 日的本澳臨時居留許可失效之決定。

2. 但是，除了給予應有的尊重外，被上訴之行政行為因違反法律而屬可撤銷，這是因為：

3. 眾司法上訴人的家屬 C 長居在澳門工作並定居，其為澳門永久性居民

身份證之持有人。

4. 而第二司法上訴人曾因在內地接受教育的原因而短暫地離開澳門。

5. 但即便如此，眾司法上訴人自 2013 年至 2021 期間，每年均有一定日子回澳。

6. 當新冠疫情緩和後，C 已立即為第二司法上訴人辦理報讀澳門本地學校的相關事項，第二司法上訴人亦於 2020 年 9 月入讀澳門 XX 學校。

7. 而第一司法上訴人亦於 2020 年 9 月在澳門本地補習中心找到工作，擔任補習導師一職。

8. 儘管眾司法上訴人曾離開了澳門一段時間，但其等離開澳門只是臨時性，並不妨礙其等仍視澳門為生活的中心。

9. 更何況，第二司法上訴人是曾因接受教育的原因才短暫離開澳門，而第一司法上訴人作為其母親，陪同照顧其起居生活亦是符合常理。

10. 就“求學”此原因而暫時離澳的期間是否仍屬於通常居住的期間，事實上澳門的主流學說皆認為是計入通常居住的期間內。

11. 本案中，眾司法上訴人是在具有正當和合理理由的情況下短暫離開澳門，為此，該等離澳期間應視為計算在“通常居住”的年期內。

12. 被上訴之行政行為因事實前提錯誤，因此，根據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 條的規定，被上訴之行政行為沾有可撤銷的瑕疵。

13. 另外，被上訴之行政行為指出根據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3 款的規定，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是維持居留許可的條件。

14. 但根據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之規定，當中規定了行政長官在批給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居留許可時，亦應考慮以下因素：(一) 刑事犯罪前科、經證實不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或本法律第四條所指的任何情況；(二) 利害關係人所擁有的維生資源；(三)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之目的及其可能性；(四) 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或擬從事的活動；(五) 利害關係人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親屬關係；(六) 人道理由，尤其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缺乏

生存條件或家庭輔助。

15. 本案中，C 一直在澳門工作，為家人提供維生資源，並為着家人的未來而鋪路。

16. 而眾司法上訴人亦已於 2020 年分別在澳門定居工作、學習，同時亦沒有作出任何作奸犯科的犯罪行為；相反，其等作為志願者積極地參與社會事務工作，為澳門作出貢獻，為澳門良好市民。

17. 更重要的是，正如 C 之初衷，其投資臨時定居澳門特別行政區之目的，都是認同澳門的生活環境，繼而決定攜同家人在澳門生根落葉定居生活，現時其亦為澳門的永久性居民，在澳門有固定工作。

18. 而第二司法上訴人亦是積極融入澳門的生活圈，包括入讀澳門的學校接受教育，並多次代表澳門學校外出比賽榮獲獎項，課餘亦積極參與澳門社會活動。

19. 因此，本案並不屬於第 5/2003 號行政法規第 24 條第 2 項及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第 4 款所規定的利害關係人沒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的情況。

20. 此外，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3 條補充適用的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3 款之規定，基於眾司法上訴人仍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眾司法上訴人亦實際具備維持居留許可的條件。

21. 更何況，由於現時 C 與眾司法上訴人共同生活在澳門，而 C 及第一司法上訴人為第二司法上訴人的主要親人和照顧者。

22. 在被上訴之行政行為作出之前，C 與眾司法上訴人均為澳門居民身份證的持有人。

23. 倘若取消眾司法上訴人之居留許可，不難想像這將使他們與丈夫、與父親分隔。

24. 我們需要考慮眾司法上訴人已持有澳門身份證多年，長期一家在澳門的生活，以澳門為生活中心，開展日常事務等事實。

25. 倘是次批准宣告眾司法上訴人之臨時居留許可失效，將對眾司法上訴人造成難以彌補的人身及心靈上的損害，亦明顯違反人道原則。

26. 所以，被訴願之行為明顯錯誤適用了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3 款及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第 4 款的規定，事實上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之規定亦應給予考慮及適用。

27. 被上訴之行政行為因法律上的錯誤，因此，根據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 條的規定，被上訴之行政行為沾有可撤銷的瑕疵。

28. 事實上，C 於 2013 年 6 月 11 日獲批惠及眾司法上訴人之臨時居留許可，而第二司法上訴人在取得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權後仍一直在中國內地就學，但每當暑假或寒假等假期期間必定會回澳。而卷宗內是有資料顯示有關事實，貿促局亦一直批准第二司法上訴人之臨時居留許可續期請求。

29. 同樣地，第一司法上訴人因照顧第二司法上訴人的日常起居，需陪同在內地一同生活，但其每年均有一定日子回澳。而卷宗內亦有資料顯示有關事實，貿促局亦一直批准第一司法上訴人之臨時居留許可續期請求。

30. 鑑於貿促局在作出批准眾司法上訴人之臨時居留續期請求前已知悉其生活狀況，但仍批准其續期請求，由此可知貿促局在作出續期批准時並未以其沒有在澳門通常居住為依據駁回有關續期請求。

31. 是故貿促局一直批准眾司法上訴人之臨時居留許可續期請求之行為，使眾司法上訴人認定其臨時居留許可並不存在任何問題，並使二人產生了對在眾司法上訴人之臨時居留許可屆滿七年後，可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之合理期盼。

32. 然而，被上訴之行政行為於 2021 年 2 月 26 日卻又以眾利害關係人在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大部份時間都不在澳門、沒有在澳門通常居住為由，作出對眾司法上訴人不利的決定。

33. 根據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 8 條的規定：“一、在任何形式之行政活動中，以及在行政活動之任何階段，公共行政當局與私人均應依善意規則行事

及建立關係。二、遵守上款規定時，應考慮在具體情況下需重視之法律基本價值，尤應考慮：a) 有關活動使相對人產生之信賴；b) 已實行之活動所擬達致之目的。”

34. 既然貿促局此前一直批准眾司法上訴人之臨時居留續期請求，根據善意原則，亦應維持有關行政行為之原意及批准 C 提交之確認聲明申請，而非宣告眾司法上訴人之臨時居留許可失效。

35. 此外，被上訴之行政行為基於一系列不可歸責於眾司法上訴人的因素而作出宣告眾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的許可失效亦損害了眾司法上訴人的信賴。

36. 因此，被上訴之行政行為因違反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 8 條規定的善意原則，故根據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 條的規定，被上訴之行政行為沾有可撤銷的瑕疵。

37. 卷宗內是有資料顯示有關事實，貿促局亦一直批准眾司法上訴人之臨時居留許可續期請求。

38. 須指出的是，被上訴之行政行為在作出宣告眾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的許可失效時，僅憑眾司法上訴人在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大部份時間都不在澳門、沒有在澳門通常居住為由，而忽略眾司法上訴人於該等期間內暫時不在澳門生活的原因。

39. C 是在考慮各項因素後，才決定安排第二司法上訴人暫時在中國內地就學及生活的，但有關安排並不代表其選擇不以澳門為常居地及生活中心。

40. 根據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 5 條第 2 款之規定：“行政當局之決定與私人之權利或受法律保護之利益有衝突時，僅得在對所擬達致之目的屬適當及適度下，損害該等權利或利益。”

41. 即行政當局在作出決定時需要衡量每個個案之具體情況，並在有關決定與私人之權利或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出現衝突時，根據適當及適度原則，將衝突所導致之損害減至最低。

42. 是故，被上訴之行政行為在作出的決定時未有衡量眾司法上訴人之具體情況作出決定，因此違反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 5 條第 2 款之適度原則，故

根據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 條的規定，被上訴之行政行為沾有可撤銷的瑕疵。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接納本司法上訴之依據並裁定：

被上訴之行政行為因事實前提錯誤、法律上的錯誤、違反善意原則及違反適度原則，撤銷被上訴之行政行為。”

*

上訴所針對之實體在答辯時提出了以下結論：

“一、經濟財政司司長於 2023 年 3 月 3 日作出的駁回 C 就貿促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代主席於 2021 年 2 月 26 日作出的不批准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的行為所提出的訴願的行為不沾有司法上訴人所指的瑕疵。

二、分析是否符合通常居住，除了考慮個人的居住地點以外，還關乎個人的生活中心及其在該地建立的各種(法律)關係，且該等關係必需是“實際且固定的”(efectivo estável)。

三、本案中，司法上訴人每年留澳日數極少，二人長期在外生活及就讀，與澳門的連繫僅有司法上訴人的配偶/父親 C 在澳的投資而已。

四、選擇適合的居住地是正常不過的事，然而，這亦是許多投資移民申請人所同樣面對的事 — 在移居到澳門還是留在原居地之間作出選擇。

五、司法上訴人以上所稱不在澳的理由，全不屬不可抗力或非其等可操縱的原因，顯然是其等選擇在內地居住原因而已。

六、司法上訴人個人上與澳門並無任何聯繫，兩人在獲得居留許可後亦未打算移居澳門。

七、從司法上訴人的留澳天數、不在澳的理由及其生活中心等事實可反映出其等客觀上根本未在澳門展開其個人生活，亦未與澳門建立任何實際且固定的聯繫，故不符合有關常居澳門的要求。

八、在比較一般制度和投資居留制度的立法目的之後，我們認為並不適宜在這個特別為吸引投資及人才的投資居留卷宗內審批以“人道理由”為由的申

請，而應以獨立個案另行申請及審批。

九、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3 款明確規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是維持居留許可的條件。

十、根據第 5/2003 號行政法規第 24 條(二)項，司法上訴人的居留許可取決於其等是否符合規範居留的一般原則性法律及法規的規定，在本個案尤指以上有關必須在澳門通常居住的規定。

十一、在此個案中立法者明規定了相關法律前題及後果，換言之，這情況下行政當局面對的是一項受羈束的行政行為。

十二、為著維持其獲批的居留許可，司法上訴人應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違反法律的行為並不因為時間過去或行政當局沒有執法而變得合法化，亦不可能對之產生正常期望或信任。

十三、本個案中，在司法上訴人未符合法律規定下，行政當局只能按法律規定執法，當中並不存有自由裁量權，故並不違反善意原則。

十四、同樣，法律並不存在行政當局可考慮的量度。

十五、基於司法上訴人多年來極少來澳的事實而判斷其不在澳通常居住亦正確，執法符合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3 款所定之目的。

十六、因此被訴決定並無不妥，沒有違反適度原則。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司法上訴人的理由不成立，並駁回本司法上訴。”

*

司法上訴人依法提交了非強制性陳述，並提出以下結論：

“一、兩名司法上訴人維持其於司法上訴之聲請書中所主張的事實及依據，並補充作出如下陳述

二、首先，兩名司法上訴人不認同兩名司法上訴人每年留澳日數極少，二人長期在外生活及就讀，與澳門的連繫僅有主申請人 C 在澳的投資而已。

三. 同時，兩名司法上訴人亦不認同被上訴實體認為兩名司法上訴人因個人意願將生活中心維持設於澳門以外的地方，而兩名司法上訴人所陳述的不在澳的理由，全不屬不可抗力或非等可操縱的原因，並由此判斷出兩名司法上訴人未與澳門建立足夠強的聯繫，所以被上訴實體認為司法上訴人不符合有關常居澳門的條件。

四. 事實上，第二名司法上訴人於 2013 年 6 月 11 日獲得居留許可時，年僅八歲。

五. 兒童階段對身心發展非常重要。對於一名僅有八歲的年幼兒童，如果突然改變他們的生活和學習環境，毫無疑問地會對他們的成長造成不良影響。

六. 根據《兒童權利公約》，全球各地都普遍認識到兒童的身心發展對他們至關重要。不論是受該公約約束的國家/地區，還是兒童的父母，都應該致力於促進兒童的身心健康發展。主申請人 C 及第一司法上訴人是特別考慮到突然改變生活和學習環境的影響，才讓第二司法上訴人暫時在中國內地繼續居住及學習，並計劃待第二司法上訴人完成在中國內地的義務教育階段後，再安排他返回澳門升讀高中。

七. 另一方面，第一司法上訴人暫時離澳也具有合理理由。

八. 主申請人 C 及第一司法上訴人作為父母，按照澳門《民法典》的《民法典》第 1844 條第 2 款及第 1537 條第 1 款規定，有責任履行扶養義務和承擔家庭負擔，其中包括對第二司法上訴人的教育責任。

九. 對於兒童來說，父母的陪伴和關懷對他們的健康成長至關重要。同時，考慮到第二司法上訴人當時是未成年人且缺乏完全自理能力，至少需要一位尊親屬時常陪伴。

十. 鑒於上述需求，經過主申請人 C 和第一司法上訴人商討後，兩人最終決定由第一司法上訴人陪同第二司法上訴人暫時離澳。

十一. 此外，從 2013 年至 2021 年期間，兩名司法上訴人都利用了“可

自由處分的時間”（即在第二司法上訴人不用上學的期間）來澳，與在澳門長期定居及工作的主申請人 C 一同生活。

十二. 另一方面，兩名司法上訴人之後的確回到澳門工作及學習，並為澳門作出良好貢獻。上述事實均能明確反映出兩名司法上訴人自 2013 年至 2021 年期間均一直有將本澳視作兩人的生活中心。

十三. 再者，第二司法上訴人是由於在外地就學而暫時離開澳門。就“求學”此原因而暫時離澳的期間是否仍屬於通常居住的期間，事實上，澳門的主流學說皆認為是計入通常居住的期間內。

十四. 根據澳門終審法院在第 190/2020 號合議庭裁判中指出：“僅從一名之前獲批在澳門的居留許可的人士“暫時不在”澳門的事實中並不能必然得出他已經不再“通常居住”於澳門的結論。”

十五. 加上，根據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第 4 款亦指出，斷定是否已不再通常居於澳門時，須考慮該人的個人情況及他們不在澳門的情況，其中包括不在澳門的原因。

十六. 因此，兩名司法上訴人只是暫時離澳，且具有合理解釋。被上訴實體不能因兩人未有在澳門實際長期居住就此斷定兩名司法上訴人放棄澳門為其生活的中心。故此，兩名司法上訴人維持司法上訴起訴狀之見解，認為其離澳期間應視為計算在“通常居住”的年期內，被訴行政行為因事實前提錯誤的瑕疵。

十七. 關於司法上訴起訴狀所述的錯誤適用法律的瑕疵，兩名司法上訴人有必要指出，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3 條明確規定了“入境、逗留及定居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般制度，補充適用於按照本行政法規的規定申請居留許可的利害關係人。”

十八. 兩名司法上訴人認為倘若沒有法律法規明確排除該適用，本案應適用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2 款 6 項。兩名司法上訴人亦重申，本案的情況亦能符合該項所述的“人道理由”。故此，兩名司法上訴人明確維持司法上訴起訴

狀內有關錯誤適用法律的瑕疵的見解。

十九. 針對違反善意原則，兩名司法上訴人重申，不論是在司法上訴起訴狀或本陳述，兩名司法上訴人均一直強調他們“暫時不在”澳門的合理性，並且從沒放棄與澳門的聯繫及澳門作為他們生活中心的想法。

二十. 事實上，自獲批臨時居留許可，兩名司法上訴人一直認為他們只是因合理原因而暫時離澳，從而符合法律規定的“通常居住”，絕不是被上訴實體於答辯狀第 42 條所指的明知居留並未符合法律規定而產生僥倖心態。兩名司法上訴人從行政當局過往的續期行為所得到的期待屬正當且合理。

二十一. 同時，針對被上訴實體在答辯狀第 44 條提出的第 5/2003 號行政法規第 24 條(二)項規定不存在任何自由裁量權的見解，兩名司法上訴人並不能認同。

二十二. 上述法律的法律要件部分明確規定應考慮按原則性法律及本行政法規規定引致許可不能維持的任何情況，尤其利害關係人沒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

二十三. “通常居住”是一個不確定概念。針對不確定概念，尊敬的澳門中級法院於 2015 年 3 月 19 日作出的第 574/2013 號合議庭裁判作出了如下見解：不確定的概念是指其內容並非為單純事實描述，僅對法律所用語言有一定程度的認知者亦不能容易掌握其意思和明瞭當中應包括的事實情況的內容和範圍，適用包含不確定概念的法律時，法律適用者必須先對具體的事實情況作出價值性的評價，方能判斷具體情況是否符合法律以不確定概念所要求成立的事實情況。

二十四. 被上訴實體透過認定本案不符合“通常居住”這一不確定概念而作出的被訴行政行為，並不是如被上訴實體在答辯狀所述不存在自由裁量權。相反，被上訴實體確實在行使自由裁量權，並且在行使該權限時沒有充分考慮兩名司法上訴人的正當及合理期待，從而違反了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 8 條之適度原則善意原則。

二十五. 基於同樣理由(即被上訴實體所運用的仍自由裁量權)，被上訴實體亦應注意及考慮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 5 條第 2 款之適度原則。

二十六. 正如兩名司法上訴人所述，兩名司法上訴人均一直強調他們“暫時不在”澳門的合理理由(即主聲請人 C 與第一司法上訴人是在考慮各項因素後才決定安排第一司法上訴人暫時離澳)，並且從沒放棄與澳門的聯繫及澳門作為他們生活中心的想法。

二十七. 同時，被上訴實體亦忽略了兩名司法上訴人現時已在澳門定居、工作及學習的事實。事實上，倘若宣告兩名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失效，他們將遭受難以彌補的損害。

二十八. 考慮到本案的實際情況，被上訴實體明顯沒有遵守適度原則，將衝突所導致之損害減至最低。

二十九. 綜上所述，被上訴實體在作出的決定時未有全面及充分考量兩名司法上訴人之具體情況而作出決定，此屬事實前提錯誤。此外，被訴行政行為未有考慮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2 款之規定，屬法律上的錯誤。同時，被訴行政行為亦違反了善意原則及適度原則。故此，被上訴行政行為沾有可撤銷的瑕疵。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司法上訴人理由成立，並裁定被訴行政行為因存在事實前提錯誤、錯誤適用法律和違反善意原則、適度原則的瑕疵，撤銷被上訴之行政行為。”

*

本法院對此案有管轄權，且訴訟形式恰當。

雙方當事人享有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正當性及訴之利益。

不存在可妨礙審理案件實體問題的延訴抗辯及無效情況。

二、理由說明

根據本案卷宗及行政卷宗所載的資料，本院認定以下對審理本

司法上訴案具有重要性的事實：

C 以投資不動產為由，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出申請，並獲得了臨時居留許可。

在此期間，C 的配偶 A 及卑親屬 B 也因此而獲得了臨時居留許可，居留許可的有效期至 2021 年 10 月 18 日。

根據兩名司法上訴人的出入境記錄，顯示他倆在 2017 年至 2020 年 5 月期間每年在澳門停留的天數分別是 2、4、16、11 天，以及 4、4、15、4 天。

2021 年 2 月 26 日，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代主席宣告司法上訴人的上述臨時居留許可失效。

C 於 2021 年 3 月 25 日提起必要訴願。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的工作人員於 2021 年 5 月 28 日編製了編號為 PRO/00857/AJ/2021 的建議書，內容如下 (詳見卷宗第 36 頁至 41 頁)：

“事由：建議駁回必要訴願 (第 2065/2008/04R 號卷宗)

投資居留及法律廳 XXX 高級經理 閣下：

1. 訴願人 C，以不動產投資為依據於 2009 年 10 月 23 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申請，其已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於 2013 年 6 月 11 日獲批惠及配偶 A 和卑親屬 B 的臨時居留許可，並於 2020 年 3 月 17 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續期至 2021 年 10 月 18 日。

2. 基於訴願人配偶及卑親屬在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沒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根據第 68/2020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代主席行使由經濟財政司司長就以不動產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作出決定的執行權限之轉授權，於 2021 年 2 月 26 日作出批示，宣告利害關係人 A、B 獲批有效期至 2021 年 10 月 18 日的臨時居留許可失效。

3. 就有關決定，本局已於 2021 年 2 月 26 日透過第 OF/00966/DJFR/2021 號公函向訴願人作出通知。根據郵電局簽收紀錄，該函件已於 2021 年 3 月 5 日被成功派遞(見附件 1)。

4. 根據第 68/2020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第 3 條規定：“對行使本轉授權而作出的行為，可提起必要訴願”。

5. 訴願人的律師於 2021 年 3 月 25 日向經濟財政司司長提起是項必要訴願(見附件 2)。

6.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55 條規定，必要訴願人須於三十日內提出必要訴願，按有關文件的簽收紀錄顯示，該必要訴願符合法定期限的規定。

7. 訴願人的律師之必要訴願主要內容如下：

1) 律師指出被訴願之行為存在事實上錯誤。訴願人為澳門永久居民，在澳門工作，且在澳門亦購有物業，並視之為其本人、配偶及卑親屬的固定居所；因卑親屬在內地升學且為未成年人，故配偶陪同在內地照顧其起居生活。

2) 即使按有關出入境紀錄顯示配偶及卑親屬曾因學習原因短暫不在澳，但其等一直以澳門為生活中心，開展日常事務，包括在澳報讀學校，參與澳門社會事務工作等。

3) 其次，律師認為被訴願行為存在法律上的錯誤。指出被訴願行為錯誤適用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3 款的規定，事實上同一條第 1 款及第 2 款之規定亦應給予考慮及適用。律師重申配偶及卑親屬曾因學習原因短暫離開澳門，現其等已在澳定居、學習，而訴願人本人一直在澳工作為家人提供維生資源；又指出配偶及卑親屬在澳門沒有作出任何犯罪行為。

4) 根據《民法典》第 30 條第 3 款規定，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之人為澳門常居民，並不取決於任何行政手續。也就是說，在被訴願之行為作出前，配偶及卑親屬為澳門居民身份證的持有人，視為澳門的常居民。

5) 參考澳門終審法院第 212/2020 號合議庭裁判：“任何剝奪資格的決定、

任何產生自具有所謂“侵害性”的行政活動的行為、甚至任何的不批准都會造成困擾、苦悶、煩惱、不快；這是人在受挫時應有的自然反應。還有可能是一種“沒面子”，一種利害關係人在面對整個社會或其所屬的(職業、社會、娛樂或運動)圈子時的不體面、一種受辱、一種深深的羞恥、一種嚴重的不悅等等。

另外，不難想像如果申請人與他最為親近的家人長期以來共同居住的已經對其產生情感依賴的房屋被拆除，又或者一名母親與其尚在年幼、仍然需要她的照顧和撫養的未成年兒子分離，必定會造成精神上的損害。”

倘不給予配偶及卑親屬的續期申請，將對其等造成難以彌補的人身及心靈上的損害，亦明顯違反人道原則。

6) 基於上述，律師認為被訴願之行為沾有事實上錯誤及法律上的錯誤，請求撤銷被訴願之行為。

8. 就是項必要訴願作分析如下：

1) 按卷宗資料顯示，行政當局是基於訴願人的配偶 A 及卑親屬 B 在臨時居留許可期間沒有在澳門通常居住而宣告其等的臨時居留許可失效。

2) 律師指被訴願行為存在事實上錯誤，強調配偶及卑親屬“一直以本澳為生活中心，開展日常事務”，就此僅提及“配偶在澳門 XX 中心擔任補習導師一職”、“卑親屬現時在澳門 XX 學校就讀”、“配偶及卑親屬曾因學習的原因短暫不在澳門生活”的事實來證明配偶及卑親屬以澳門為生活中心；然而，從律師提交的文件顯示，配偶僅於 2020 年 9 月 28 日起於澳門 XX 中心擔任導師，而卑親屬於 2020 年 9 月才入讀澳門 XX 學校，相關事實不足以反映其等於 2020 年 9 月前(即在獲准臨時居留許可期間)一直在澳工作、讀書，更未能顯示其等以澳門為生活中心。

3) 再者，透過治安警察局發出的出入境紀錄顯示利害關係人 A、B 於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期間每年留澳日數極少，皆不超過 16 天，並且卷宗有資料顯示 2010 年至 2019 年期間，配偶在“廣東省江門市 XX 中學”

擔任教師，而卑親屬分別就讀於“廣東省江門市 XX 小學”及“廣東省江門市 XX 中學”。

4) 此外，律師亦於必要訴願中明確指出卑親屬“為未成年人，於 2017 年至 2021 年 5 月期間，曾在內地接受教育”，而配偶“陪同在內地照顧其起居生活”；儘管訴願人在澳門購買了物業，但以上事實反映了配偶及卑親屬其個人、家庭及社會生活基礎不在澳門。

5) 綜上所述，利害關係人在上述臨時居留許可期間非但沒有在澳門居住、就讀、工作，也沒有在澳門開展日常生活事務，其等最為重要的生活及生存聯繫之固定核心的地方並不是澳門。

6) 另須指出的是，儘管卑親屬為未成年人，但根據《民法典》第 1733 條第 1 款及第 1736 條第 1 款規定，訴願人及配偶作為未成年利害關係人之法定代理人，且均具備澳門居民身份，為著於本澳居留之效力，應為卑親屬履行通常居住本澳之規定提供必要的協助及安排，故卑親屬在內地讀書取決於訴願人及配偶的意願。

7) 顯然配偶及卑親屬選擇在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在內地工作、讀書乃個人意願而非基於不可抗力的理由，這並不構成暫時不在澳門的合理理由，亦不能推翻其等於上述期間沒有通常居住於澳門的事實。

8) 律師所主張的利害關係人個人情況及不在澳門的因素，已於被訴願行為中被考慮，因此，當中並沒有存在事實前提錯誤的瑕疵。

9) 律師又指被訴願之行為沾有法律上的錯誤，錯誤適用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3 款的規定。

10) 在本個案中，訴願人之配偶及卑親屬是按照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5 條規定以家團成員身份而獲批臨時居留許可，故須遵守上述行政法規第 23 條所補充適用的法律規定，即第 4/2003 號法律《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的一般原則》。

11) 上述法律第 9 條第 3 款的規定：“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是維持居留許可的條件”。而根據第 5/2003 號行政法規第 24 條(二)項的規定，“出現按原則性法律及本行政法規規定引致許可不能維持的任何情況，尤其利害關係人沒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是引致居留許可失效的原因。

12) 根據上述條文，行政當局為確保利害關係人遵守上述法律規定，不論在有關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審批期間或已批准有關續期申請，有必要審查其等是否確實以澳門為通常居住地。因此，未見被訴願行為沾有錯誤適用法律的瑕疵。

13) 律師還主張根據《民法典》第 30 條第 3 款規定，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之人為澳門常居民，並不取決於任何行政手續。

14) 然而，這並不影響權限當局對於利害關係人是否在澳門通常居住存疑時進行審查，須強調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賦予行政當局處理臨時居留許可的權限，行政當局有義務對利害關係人是否維持法律所規定的要件作出調查；更何況，上述條文所規定的法律推定，根據《民法典》第 343 條第 2 款規定，可以通過完全反證推翻，在本個案中，透過利害關係人的出入境資料、卷宗資料文件以及是項必要訴願所述，相關事實足以推翻上述推定。

15) 針對律師所指違反人道原則，在此引述澳門終審法院第 17/2017 號的合議庭裁判，當中指出：“三、考慮到投資居留制度的立法意圖及其擬達致的為澳門吸引投資的目標，應該認為投資居留的行政程序並非審查是否應基於利害關係人所提出的人道理由批准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的適當程序。”因此，有關觀點並不能成立。

16) 就訴願人卑親屬 B 於 2021 年 4 月 12 日提交的書面聲明及證明文件(見附件 3)，儘管證實卑親屬於 2020 年 9 月入讀本澳 XX 學校，且在校表現良好、成績優異，然而，須重申的是，卑親屬藉以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5 條規定之家團成員身份獲批臨時居留許可，為臨時居留許可制度法律法規所規範之利害關係人，故須遵守有關通常居住的強制性法律規定。

17) 此外，透過上述文件，亦證實卑親屬於 2019 年 5 月被 “XX 中學” 錄取並就讀該校高中一年級，結合其自 2017 年起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期間甚少的留澳日數(分別為 4、4、15 及 4 日)、卷宗資料文件及是項必要訴願所述及之內容，足以證明卑親屬自 2020 年 9 月回澳前的生活及學習中心在內地，由此再次印證其沒有通常居住於澳門的事實。

18) 總結而言，行政當局是基於訴願人的配偶 A 和卑親屬 B 於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大部份時間都不在澳門，且透過各項資料，經綜合考慮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第 4 款所指之各種情況，得出配偶及卑親屬沒有在澳門通常居住的結論，這樣，行政當局就必須宣告其等的臨時居留許可失效。

19) 基於此，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代主席於 2021 年 2 月 26 日所作的因利害關係人 A、B 沒有在澳門通常居住而宣告其等獲批至 2021 年 10 月 18 日的臨時居留許可失效的決定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亦未顯示當中違反了任何法律規定及原則。

9. 綜上所述，本局對本個案進行覆檢，基於以上事實與法律依據，有關行政行為依法作出，合法適當，經研究分析是項必要訴願，由於未能證實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司長轉授權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代主席於 2021 年 2 月 26 日所作的宣告利害關係人 A、B 的臨時居留許可失效的決定有違法或不當之行為，故建議呈請經濟財政司司長閣下駁回是項必要訴願，並維持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代主席於 2021 年 2 月 26 日作出的決定。

上述意見，謹呈上級審閱及批示。”

被訴實體於 2023 年 3 月 3 日作出了如下批示 (詳見卷宗第 36 頁)：

“同意本建議書的分析，根據第 3/2020 號行政命令所授予之權限，駁回必要訴願，並維持原決定。”

司法上訴人對此不服，向中級法院提起本司法上訴。

*

檢察院助理檢察長就本司法上訴發表了以下寶貴意見：

"Nestes autos, os recorrentes pediram a anulação do despacho exarado pelo Exmo. Sr. SEF na Proposta n.º PRO/00857/AJ/2021 (doc. de fls. 42 a 47 dos autos), que reza expressamente: 同意本建議書的分析，根據第 3/2020 號行政命令所授予之權限，駁回必要訴願，並維持原決定。

Por força do n.º 1 do art. 115.º do CPA, a clara declaração de "同意本建議書的分析" implica que o despacho in questio absorve integralmente a apontada Proposta que chegou à seguinte conclusão: 18). 總結而言，行政當局是基於訴願人的配偶 A 和卑親屬 B 於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大部分時間都不在澳門，且透過各項資料，綜合考慮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第 4 款所指之各種情況，得出配偶及卑親屬沒有在澳門通常居住的結論，這樣，行政當局就必須宣告其等的臨時居留許可失效。

Ora, tudo isto evidencia concludentemente que por via de manter o despacho proferido em 26/02/2021 pelo presidente do IPIM, o despacho ora recorrido consiste, no fundo, em declarar a caducidade d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dos recorrentes.

Posto isto e devido às três razões, vamos limitar-nos a analisar os quatro vícios invocados pelos recorrentes, quais são o respeito pela personalidade e pela autonomia

da vontade dos interessados (que são in casu os recorrentes), a obediência ao princípio do dispositivo e, ainda, que não se divisam, no caso sub judice, vícios do conhecimento oficioso.

*

1. Do erro nos pressupostos de facto

Os recorrentes invocou, em primeiro lugar, erro nos pressupostos de facto, rezando que “65. 儘管眾司法上訴人離開了澳門一段時間，但其等離開澳門只是臨時性，並不妨礙其等仍視澳門為生活中心。66. 更何況，第二司法上人是曾因接受教育的原因才短暫離開澳門，而第一司法上訴人作為其母親，陪同照顧其起居生活亦是符合常理。67. 就“求學”此原因而暫時離澳的期間是否仍屬於通常居住的期間，事實上澳門的主流學說皆認為是計入通常居住的期間內”。

No art. 11.º da petição inicial (cfr. fls. 103 a 120v dos autos), alegaram os recorrentes o facto de que a autorização da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deles obteve a renovação válida até 18/10/2021; o que importa acrescentar é que é o despacho proferido pela então presidente do IPIM em 17/03/2020 que deferiu o pedido da sobredita renovação (doc. de fls. 46 a 49 do P.A.). Daqui flui concludentemente que é facto alegado e provado que tal renovação era válida no período compreendido desde 17/03/2020 até a 18/10/2021.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19.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3/2005, entendemos tranquilamente que é criteriosa a jurisprudência que inculca “當局需要審查的是申請

人在居留許可有效期內是否符合續期的法定條件” (cfr. Acórdão do TSI no Processo n.º 187/2023). O que significa que para indagar se os recorrentes residiram habitualmente em Macau, o IPIM devia tomar como base o sobredito período de 17/03/2020 até 18/10/2021.

Porém, a Proposta n.º PRO/00387/DJFR/2021 revela, sem mínima dúvida, que para abonar a decisão de declarar a caducidade da renovação supra aludida, a então presidente do IPIM substituta teve como base os dias de estadia em Macau (dos dois recorrentes) no período de 01/01/2017 até 31/05/2020 (doc. de fls. 57 a 59 do P.A.), incorrendo em um erro.

Ora, salta à vista que o período de 01/01/2017 a 31/05/2020 não só se distingue do de 17/03/2020 a 18/10/2021, mas também torna inegável que a Administração não tomou em devida consideração os factos alegados nos arts. 60.º e 61.º da petição (第二司法上訴人於2020年9月入讀XX學校·第一司法上訴人亦於2020年9月在澳門本地補習中心找到工作).

Tudo isto leva-nos a opinar que o despacho em escrutínio padece do erro nos pressupostos de facto.

*

2. Da arguida violação de lei

Repare-se que o art. 106.º da Lei n.º 16/2021 que encontra publicada em 16/08/2021 dispõe: A presente lei entra em vigor 90 dias após a sua publicação, com excepção

do artigo 97.º, que produz efeitos a partir da data da sua publicação, e dos artigos 60.º e 61.º e correspondentes previsões em matéria de infracções administrativas, que produzem efeitos um ano após a data da sua entrada em vigor.

Daqui flui, com toda a firmeza, que datado de 03/03/2023, o despacho in questio é proferido na vigência da Lei n.º 16/2021. Sendo assim e de acordo com a jurisprudência assente dos doutos TSI e TUI (a título exemplificativo, cfr. arestos do TUI nos Processos n.º 124/2021 e n.º 143/2021), temos por adquirido que ao mesmo despacho se aplica a Lei n.º 16/2021.

Ora, a Proposta n.º PRO/00857/AJ/2021 evidencia, sem sombra de dúvida, que o despacho in questio tomou como base legal a Lei n.º 4/2003, nomeadamente o n.º 3 do art. 9.º desta Lei, que prescreve: A residência habitual do interessado na RAEM é condição da manuten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O que germina um relevante erro de direito. Com efeito, é pacífica a jurisprudência do douto TSI (a título exemplificativo, cfr. Acórdão dele no Processo n.º 321/2023), segundo a qual nos termos da alínea 3) do n.º 2 do art. 43.º da Lei n.º 16/2021, ter residência habitual na RAEM deixa de ser conditio sine qua non da manuten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Para além disso, vale a pena realçar que o legislador

consagra seis mecanismos destinados a acabar as autorizações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ou as respectivas renovações, quais são: a declaração da nulidade, a revogação abrogatória, a revogação anulatória, o indeferimento da renovação e a declaração da caducidade, e que desde a Lei n.º 16/2021 e 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38/2021 entraram em vigor, a caducidade da autorizações e da renov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estão previstas nas alíneas 1) do art. 42.º da Lei n.º 16/2021 e 1) do art. 20.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3/2005. Daí decorre que a falta e a perda da residência habitual deixam de ser motivo da caducidade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O que revela que o despacho atacado no recurso contencioso em apreço fere a errada aplicação da lei, na medida em que a declaração da caducidade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dos três recorrentes) operada pelo mesmo está desconforme com o seu fundamento.

*

3. Da invocad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boa fé

Os recorrentes assacaram ainda a ofensa do princípio da boa fé ao despacho in questio, inferindo que tal despacho não só contradiz a anterior posição administrativa quanto à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Macau, mas também frustra injustificadamente a expectativa legítima de eles virem obter o estatuto jurídico de residente permanente da RAEM.

Na sociedade de Macau, sabe-se que durante longo tempo seguinte à entrada em vigor do D.L. n.º 14/95/M, a praxe administrativa consistia em achar que a manutenção e 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não dependem de ter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Macau, isto é, a residência habitual era considerada irrelevante.

O caso sub judice serve de exemplo paradigmático da sobredita praxe administrativa. Com efeito, a Proposta n.º 2065/2008/04R evidencia, com toda a certeza, que o despacho datado de 17/03/2020 deferiu 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do recorrente (doc. de fls. 46 a 48 do P.A.), sem mostrar mínima atenção para saber se ele tivesse ou não, na devida altura, a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Macau.

Saliente-se que é igualmente consabido que a partir de certa altura, a Administração deixou tal praxe e concomitantemente vem adoptar a nova posição, no sentido de fazer da residência habitual a condição da manutenção e d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Sendo assim, é de realçar que a jurisprudência uniforme vem asseverando que:

- A Lei n.º 4/2003 se aplica subsidiariamente a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3/2005 e, de outra banda, é injuntiva a disposição no n.º 3 do art. 9.º desta Lei (a título meramente exemplificativo, cfr. Acórdão do TUI no

Processo n.º 182/2020 e Acórdãos do TSI nos Processos n.º 866/2020 e n.º 993/2021).

- Sendo embora preceitos permissivos, os n.º 2 e n.º 3 do art. 43.º da Lei n.º 16/2021 consagram a regra geral de que a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Macau constitui a condição da manutenção e d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podendo essa condição ser excepcional e casuisticamente dispensada pelo Chefe do Executivo.

Daí decorre que a supramencionada praxe administrativa é ilegal por infringir o n.º 3 do art. 9.º da Lei n.º 4/2003. Assim sendo, e por força do princípio da legalidade, a Administração pode e deve abandonar tal praxe, por isso, esse abandono é legalmente justificável.

E o que é concludente é que a sobredita "nova posição", traduzida em a manutenção e 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dependerem, em princípio, de ter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Macau, está em conformidade não só com o n.º 3 do art. 9.º da Lei n.º 4/2003, mas também com a mens legis dos n.º 2 e n.º 3 do art. 43.º da Lei n.º 16/2021.

Chegando aqui, somos conduzidos a concluir que a adopção da nova posição e a imediata aplicação da mesma aos pedidos de renovação que venham ter lugar são legais e não merecem censura, pese embora tal nova posição seja contrária à referida praxe administrativa.

Salvo erro, afigura-se-nos que na petição, os recorrentes não invocaram que o despacho in questão implicasse tanto a aplicação retroactiva da referida nova posição como a destruição do direito adquirido deles, e tal aplicação retroactiva não é do conhecimento oficioso.

Nesta linha de ponderação e sem prejuízo do elevado respeito pelo melhor entendimento em sentido diferente, inclinamos a opinar que o despacho recorrido não contende com o princípio da boa fé, pelo que se naufraga a arguição do recorrente neste sentido.

*

4. Da assacad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Em relação à assacada violação dos princípios da proporcionalidade, afigura-se-nos que convém apontar que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da gramática e da hermenêutica, o verbo "pode/podem" denota seguramente que os n.º 2 e n.º 3 do art. 43.º da Lei n.º 16/2021 são preceitos permissivos.

E, importa ter presente que vê solidamente consolidada a jurisprudência dos Venerandos TSI e TUI, no sentido de que é discricionário o poder atribuído pelos sobreditos n.º 2 e n.º 3 ao Chefe do Executivo, daí decorre que ter residência habitual na RAEM não é condição sine qua non ou vinculativa da manutenção da autorização da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e que o facto de não ter ou deixar de ter

residência habitual na RAEM não tem virtude de determinar inevitavelmente a revogação ou a recusa de renovação ou de prorrog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No caso sub judice, é de destacar, em primeiro lugar, que não há mínima dúvida de que datado de 03/03/2023, o despacho em questão foi proferido na vigência da Lei n.º 16/2021 e, de acordo com a jurisprudência assente dos Venerandos TSI e TUI, esta Lei se aplica ao vertente caso.

De outro lado, é de realçar que a Proposta n.º PRO/00857/AJ/2021 revela que o único fundamento da declaração da caducidade de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traduz apenas em eles não terem residência habitual na RAEM no período de 01/01/2017 a 31/05/2020 – não invocando o IPIM nenhum outro fundamento.

Repare-se que de acordo com a jurisprudência praticamente pacífica, não há nenhuma dúvida de que a base legal para decidir do pedido de renovação da recorrente consiste no n.º 3 em conjugação com a alínea 3) do n.º 2 do art. 43.º da Lei n.º 16/2021 e tais n.º 2 e n.º 3 atribuem poder discricionário ao Chefe do Executivo (a título exemplificativo, vide. Acórdão do TSI no Processo n.º 136/2023). Assim sendo e à luz da regra hermenêutica, os apontados n.º 2 e n.º 3 são normas permissivas, não injuntivas.

Porém, na Proposta n.º PRO/00857/AJ/2021 lê-se a clara

asserção de que "18). 總結而言，行政當局是基於訴願人的配偶 A 和卑親屬 B 於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大部分時間都不在澳門，且透過各項資料，綜合考慮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第 4 款所指之各種情況，得出配偶及卑親屬沒有在澳門通常居住的結論，這樣，行政當局就必須宣告其等的臨時居留許可失效" (vide. fls. 41 dos autos, sublinha nossa).

Bem vistas as coisas, tal asserção comporta inegavelmente um manifesto erro na interpretação do n.º 3 do art. 43.º acima. O que nos conduz a inferir que na medida em que acolhe essa asserção, o despacho em questão enferma da mesma errada interpretação que, no fundo, consubstancia na errada qualificação do poder discricionário no vinculado.

Salvo devido e elevado respeito pela opinião diferente, entendemos modestamente que por maioria da razão, esta errada qualificação do poder discricionário no poder vinculado implica, conatural e inevitavelmente, a inobservância a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Seja como for, parece-nos que na Proposta n.º PRO/00857/AJ/2021 não se descortina nenhuma análise com vista a apurar se a declaração da caducidade fosse adequada, necessária e equilibrada?

Nesta linha de raciocínio, inclinamos a opinar que se verifica in casu a assacad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por não exercer o poder discricionário. Este vício não conduz à obrigatoriedade de deferir o pedido dos recorrentes, significa apenas que se terá de exercer

legalmente o poder discricionário e de reanalisar o pedido dele.

Por todo o expendido acima, é do nosso parecer a procedência d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

終審法院在案件編號為 21/2004 的合議庭裁判中表示：“...在撤銷性司法上訴中檢察院司法官不是當事人。因此，沒有法律規定妨礙法官以認同檢察院文本內容來說明裁判理由...”。

檢察院助理檢察長已就本司法上訴中提出的所有問題發表了全面且精闢的意見。合議庭完全採納有關意見，這些意見為審理本司法上訴提供了充分的依據。

正如助理檢察長在意見書中所述，2020 年 3 月 17 日，兩名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獲准續期，有效期至 2021 年 10 月 18 日。

事實上，被訴實體需要審查的是兩名司法上訴人在居留許可有效期內（即是 2020 年 3 月 17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8 日）是否符合給予續期的法定條件。然而，被訴實體在作出本司法上訴所針對的決定時卻考慮了司法上訴人在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期間的情況。換言之，被訴實體考慮了不該考慮的事宜，這顯示出當局在事實前提上存在錯誤。

誠然，在被訴批示作出之日，第 16/2021 號法律已經生效。

根據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第 3 項的規定，若利害關係人不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又或不再符合給予居留許可所定的任一要件、前提或條件，行政當局可廢止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居留許可。

此外，根據該法律第 43 條第 3 款的規定，在相同情況下，行政當局亦可拒絕其居留許可的續期或延期。

根據同一法律第 42 條第 1 款的規定，居留許可會因所給予的許可期間屆滿，或最近一次續期、延長的期間屆滿而失效。

由此可見，被訴實體宣告居留許可失效，存在法律適用上的錯誤。

此外，正如助理檢察長所言，儘管行政當局過往一直批准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但不論是過去的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3 款，還是現在的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及第 3 款，均明確規定，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尤其是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5 款），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是維持居留許可的條件。

因此，行政當局在被訴批示中所提出的，要求利害關係人需在澳門通常居住，這一要求是嚴格遵守法律規定的，並不違背善意原則。

最後，即使相關人士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也並不必然導致其居留許可被廢止或無法獲得續期，因為法律賦予了行政當局一定的自由裁量權。

在本案中，被訴實體強調當局必須宣告司法上訴人的居留許可失效。對此觀點，合議庭採納助理檢察長的精闢見解，認為當局在法律適用上確實存在錯誤，因其未對司法上訴人的具體情況加以考慮，恰當地行使自由裁量權。

基於以上分析，本院認為被訴的行政行為存在違反法律的瑕疵，因此裁定司法上訴理由成立。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裁定司法上訴人 A 及 B 針對經濟財政司司長提起的**司法上訴理由成立**，准予撤銷被質疑的行政行為。

被訴實體享有訴訟費用的豁免。

登錄及作出通知。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4 年 10 月 17 日

唐曉峰

(裁判書製作人)

Rui Carlos dos Santos P. Ribeiro (李宏信)

(裁判書製作人)

馮文莊

(第一助審法官)

米萬英

(助理檢察長)